

彭真四次视察南韩继村

张玉泉

位于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南端的南韩继村，现有三百余户，千余口人，有粮田面积千余亩，自然规模在全地区较小，总面积仅有6平方公里。

上世纪60年代，时任北京市市委书记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曾于1963年初夏、1965年麦秋、1966年4月和1991年6月，先后四次视察了南韩继村。

1963年夏收刚刚开镰，彭真第一次来到南韩继视察，主要是看小麦的长势。他在房山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村党支部书记徐庆文、生产大队长王文中的陪同下，从村东到村西，一块地一块地地看小麦长势，兴趣昂然地问徐庆文和王文中亩产能到多少？总产会不会超过去年？当前生产上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徐庆文说：主要是解决水的问题，要扩大水浇地面积，还要继续打井，需要一些水利配套物资等问题。



1991年6月12日彭真(左一)在南韩继视察

彭真回去不久便给村里解决一批电线杆、电线和一些水泥管。当年秋天，彭真还派了一支打井队，干了两三个月，连续给南韩继打了4眼深井，还配上电机等设备。

1965年麦收前夕，彭真在县委副书记张令德、县长曹庶民等陪同下，第二次来到南韩继村。那天徐庆文出差，由大队长王文中接待。彭真指着道南一片麦田问：“这是你们的地吗？”王文中说：“是”。彭真问：“这样的长势亩产能打多少？”王文中说：“也就是300多斤吧。”他们顺着地埂向南越过一条渠，走向南侧的一块杆粗穗大刚刚泛黄的小麦，此地显然比北侧那块地的小麦长势强壮。彭真指着这块地兴奋地问：“这块小麦长得不错么，能打多少斤？”王文中说：“400斤上下”。彭真听后笑了，说：“老王，你说得还挺有余地”。转

头又跟张令德说：“他说的 300 多斤、400 斤上下，还没收口儿。恐怕 400 斤也挡不住吧。”彭真说秋后市里准备召开农业生产会，打算让南韩继在会上发言。他要秘书详细了解一下，让村里先准备个材料。

1966 年 4 月，彭真再一次来到南韩继。这次，他在地里转了一下，看了看小麦返青情况，就直接进了大队部，此次来主要是了解村里的全面情况，他让徐庆文、王文中在他的对面坐下，向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请他们回答，如：村里现在形势



上世纪 50 年代末轰轰烈烈的积肥运动

如何？粮食产量前三年怎样，现在的总产、亩产、收入是多少？村里的发展都表现在哪些方面？集体储备、财务收支、社员分配情况如何？

围绕这些问题，徐庆文、王文中作了详细汇报。当他听到村里每年向国家交售几十万斤优质粮，库里还存几十万斤时，他高兴地说：“你们做得好啊！如果全郊区都像你们这样，全市一千万人的吃饭问题就好办了，国家就可以少进口粮食。农业搞了上去，吃饭问题就解决了，这是件大事，你们要继续努力”。

彭真为何对南韩继村如此关注呢？

从五十年代初到“文革”前，南韩继人就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的方针，成为全市农业生产的楷模。为后来连续 8 年达到亩产吨粮的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土改”后，南韩继人经过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终于在 1957 年甩掉了缺粮的“帽子”，粮食亩产达到了 178 公斤。党支部决定在这年大搞兴修水利——打井。

消息一传出就引起部分村民的疑惑：“宁盖十间房，不打一眼井。”有的说：“咱们村是个不到黄泉不见水的地方，打井行吗？”确实，南韩继虽是旱高台，可地处河滩，地下全是沙石，极易坍塌，打井很危险。

然而，南韩继人从 1957 年开始，奋战到了 1966 年近 10 个年头，在这个旱高台上共打了 107 眼土井，最深的达 400 多米。在此基础上还打了 7 眼

能用机泵抽水灌溉的机井，先后投工 4 万多个。

在抗旱打井的同时，南韩继人还掀起两个生产高潮：一是大平大整土地的高潮，为了便于灌溉，他们从 1958 年深冬开始，组织了 160 多名男女整半劳力摆开平地战场。连续干了八、九年，削平了 4 座高岗，填平了 18 条大沟，用了 30 多万个工，运土 320 万立方。平整了 510 多亩土地，使过去的零散地块连成片。为以后实现机械化作业打下了基础。二是常年开展积肥高潮，多施农家肥，改良土壤结构。南韩继人自 1959 年早春开始就成立了一支由四十多人组成的积肥专业队，常年坚持打青肥、沤绿肥、到农户、工厂掏粪、广辟肥源。还动员社员积肥。年年坚持施有机肥，使千亩农田肥力普遍达到二三级标准，土壤改良了，土质松软透气了，给农作物生长创造了有力条件。

从那时起，北京市委、市人委在京郊树起的粮食高产的大旗，就高高飘扬在旱高台上。时任党支部书记的徐庆文也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南韩继人艰苦奋斗创高产的事迹，怎能不引起彭真同志的浓厚兴趣和极大关注呢？他抓住这个高产典型在全市乃至全国推广，从而大力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就是彭真三次视察南韩继的历史背景。

1991 年 6 月 12 日，年过七旬的彭真同志，第四次来南韩继村视察。这天时至中午，在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孙书新等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机械收割，了解南韩继村发展经济的情况，听取了孙书新的汇报。

改革开放后的十年，南韩继人不断解放思想，打破了单一的农业生产模式，利用当地资源与国营工业联合，先后办起了水泥厂、电动剃须刀厂、五金厂、砖厂、镀锌厂、运输队等 11 个村办厂。开辟了 20 亩水面发展养鱼、建成了 3 千头瘦肉型猪场，万只鸡厂。从而彻底摘掉了“高产穷队”的帽子。1978 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 185 元，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到了 1989 年人均收入已达 1300 元，比 1978 年增长了 6 倍。至 1991 年人均收入达到 3500 元。80% 的村民住上了二层小楼。

改革开放以来，南韩继人坚持实行“以农为本，多种经营，以工促农，全面发展”的方针。使南韩继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收入占全村经济总收入的比重由过去的 90% 变为 9%。过去南韩继向国家贡献的主要是粮食。到了 1990 年，情况大不一样了。这一年，他们不仅保持了连续 8 年亩产吨粮的纪录，使粮食单产仍居于京郊之首。每年除向国家交售 42.5 万公斤粮食外，还交售 694 头肉猪，7.4 万公斤鲜蛋。向市场提供 4.7 万吨水泥等，向国家缴纳税金 77.6 万元。

在南韩继正处于全面发展的时候，彭真委员长的此次视察，不仅给南韩继村的干部、群众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也使他们的奋斗目标更加明确。

陈叔通副委员长到房山视察

魏志华

1963年7月，房山县人委（县政府）接到北京市政府的通知，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将于8月到房山视察。视察的内容是贯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条例》（简称“六十”条）后的变化。而且明确提示不看先进村，要看有代表性的中等村。经县长办公会研究，视察地点定在当时的周口店公社瓦井大队。因为这个村从自然条件、工作基础、尤其是农业生产，在全县都属中等偏下的村。并责成我去做视察的准备工作（我当时在县人委办公室工作）。我到瓦井村召开了大队党支委会，说明来意，对视察的各项准备工作进行了认真地研究。最后确定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郗少宗负责资料的准备，并负责向代表汇报。大队党支部书记刘金凯和治保主任负责生活安排及保卫工作。准备工作最大的难题是没有会议室，没法接待。大队虽有几间屋子但都很小，最后确定到村里小学校，占一间大的教室（当时学校正在放暑假）。同时抽调几名年青的女社员负责卫生和服务工作。

代表正式视察是8月下旬。视察那天，副县长王新华和我参加接待，同时去的还有周口店公社主任陈士民。我们都提前到村对各项准备工作又进行了一次检查。

上午9点多钟，全国人大代表到村。有两、三辆高级小轿车，一辆大轿子车。带队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中苏友协副会长邵力子，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建国后第一任农业部长李书诚。除了36名全国人大代表外，还有10几名“特殊”的人物，如爱新觉罗·溥仪、他的弟弟溥杰，还有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王耀武、宋希濂、陈长捷等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他们都是1959年后特赦的战犯，特赦后大部分安排在全国政协任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他们这次来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参观、学习，受教育。为了安全，这些人的身份没有在会上介绍，而是由全国人大办公厅来的同志向县里我们几个人个别说的。在接待代表的教室里，用十几张学生课桌并在一起，摆

成一个长方形的会议桌。靠墙的四周放了十几条板凳。出于好奇，我对溥仪、溥杰、杜聿明、郑洞国等几个人多看了几眼。溥仪个子不高，戴眼镜，尖下颏，比较瘦，穿着风衣。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等人，都是60来岁（溥仪那年是57岁，杜聿明59岁），穿着普通的中山装，说话都很和气，自觉地坐在后边的板凳上。

代表们休息一会儿以后，郗少宗汇报了村里的情况。这个村有500多户，2000多口人，3000亩耕地，自然条件很差，南、北、西三面是丘陵坡地，只有村东，房张公路两侧是平地，多一半不能灌溉。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化后，由于农村普遍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由生产队核算改为公社核算、大队核算，取消了按劳分配制度，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生产受到很大破坏。加上自然灾害、粮食连年减产。同时，由于农村普遍实行了食堂化，管理不善，群众的生活出现了不少问题。虽然没有饿死人，但挨饿的不少，很多人得了浮肿病。1962年以后，认真贯彻了中共中央“六十条”和党在农村的多项方针政策，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大队核算改为生产队核算，恢复了“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制度，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解散了农民食堂，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根据村里的自然条件，实行“坡地扶唇长堰，平地连成一片。”积极打井、平整土地，精耕细作。粮食连年增产，收入逐步增加，集体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1962年粮食总产190万斤，比1960年增产100万斤，翻了一番。1963年夏粮丰收，秋粮也长势喜人。听完汇报后，代表们进行了热烈发言。对瓦井大队几年来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并对群众生产和生活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大队干部都一一作了回答。同时对为何发展粮食生产，有些代表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如李书诚代表介绍了几种玉米的优良品种，建议大队试种。

大队汇报完了以后，代表们在开会的教室吃午饭。为了不给群众增加负担，不叫大队准备饭，而是从北京统一带的。有面包、香肠、鸡蛋、牛奶。大队只是用村里自己生产的豆角、黄瓜、西葫芦等，做了几个素菜和汤，代表们都很满意。

吃完午饭，代表们要到地里看庄稼。那天下午正好下了雨，当时村里、地里都是土路，道路很滑，陈叔通、邵力子、李书诚他们年岁又大（当时陈叔通已87岁、邵力子83岁）。我们劝他俩在大队休息，他俩不肯，坚持要和代表们一起到地里去。他们到了村南、村北，又到了村东，每到一个地方下车后要走半个多小时，边看边问，问得很细致。他们不仅问农业生产，还问瓦井村的

历史。他们听说瓦井村是因为村南有一个汉代用瓦砌的大井而得名，他们看完庄稼后又看了这口汉代的古井。同时还看了几处人工抗旱打的井，与干活的群众进行交谈。直到下午四点多钟才上车回京。临走时，陈老等代表一再嘱咐各级干部一定要认真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抓好农业生产，多打粮食。

全国人大代表走后，我们和村干部一起又进行了座谈，对代表们提出的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回县后，我们又把这次全国人大代表视察的情况，在县长办公会议上进行了汇报。大队干部也将这次视察的情况向全村干部和群众进行了传达。

国务委员谷牧视察房山

李 耀

1986年6月8日，国务委员谷牧来房山视察云居寺修复工程和房山的旅游事业。陪同视察的有国务院副秘书长王书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杜星垣，副处长马祖澎、王维澄，国家计委副主任刘中一，国家旅游局局长韩克华，市政府副市长陈昊苏，市旅游局局长宋文成，市委研究室副主任于英士等领导，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接待并陪同视察。我时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也亲自参与了接待工作。

国务委员谷牧一直对云居寺的遗址建设和文物保护十分关心，早在1979年5月1日就曾来云居寺视察，面对残破的寺庙遗址和恶劣的石经碑塔的保护环境十分担忧，回京后立即责成市建委负责解决云居寺的文物保护问题，市建委遵照指示，在当时财力、物力都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拨款14.3万元，新建了石经库房和陈列室，并在云居寺遗址上建起了围墙，大大地改善了云居寺遗址和文物保护的条件，为以后云居寺的修复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来到云居寺视察，谷牧参观了石经、经书和碑塔，视察了正在施工的云居寺修理工程，又听取了副市长、云居寺修复委员会主任陈昊苏关于修复云居寺的目的、意义、功能和修复规划以及施工情况的汇报，表示赞赏，并就对石经和经书的保管、研究、整理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于云居寺修复的建筑形式问题，谷牧说：修复工程在建筑形式和风格上要注意与寺庙的历史协调起来。一千多年的寺庙建设不可能是一个朝代修建起来的，修复工程如果全是清代的建筑形式就不协调了，对已修复完的殿堂，可以加上一点辽金或其他朝代建筑特点的



国务委员谷牧(左三)在云居寺视察

标记弥补一下就可以了。

关于石经的保管与陈列问题。谷牧说，房山石经数量之多，刻经工程量之大，学术价值之高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定要保管好。现在这种叠垒的保管方法既不利于观瞻，也容易磨损风化，如遇地震等灾害就更容易遭到破坏，市政府要请专家拿出保护和保管的理想方案。关于石经的保护问题要找赵朴老（指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和专家研究一下，定个方案，国家出点钱没问题，标准要高一些，一年建不成可以分期建，建成以后，这里也就成了研究佛经的中心和旅游点了。

关于石经、经书的整理研究工作。在参观石经时谷牧曾向解说员询问现存的 14000 多块石经共有多少部佛经，有没有重复的内容，石经共有多少万字等问题，但解说员和陪同视察的同志都不能回答。因此谷牧提出要请专家研究和整理，要建成展览厅供人观瞻，石经陈列要分出刻经的朝代，这样既欣赏了历代的石经文化，又可欣赏不同时代的书法和雕刻艺术。在参观经书库房时，对保管条件表示担心，指出这些经书也是无价之宝，要请懂行的人进行整理并妥妥善保管，一定要防止丢失和霉坏。

中午，谷牧国务委员一行，到县招待所用餐。下午，又到石花洞参观视察，并听取了县领导关于开发石花洞风景旅游点的工作汇报，表示赞赏和支持，下午 5 点多离房山返京。

房山县下放干部管理工作回顾

罗玉源 孙奎春 张 珍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经过几年动乱，于1968年市和区、县相继建立革命委员会。根据“精兵简政”的原则，革委会办事机构均采取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模式——“大组套小组，上下一般粗”。在人员组合方面，军队干部参与地方领导班子，同时由外地调入一批干部，加之当时上层建筑诸多领域不能正常运转，以致造成大批机关干部被精减下岗。如何妥善安排这些同志的去向呢？毛泽东主席适时发出了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

1969年5月，市革委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决定将原市政府、共青团、公安局、文联、北京日报社等机关单位一千多名干部，下放到房山县参加劳动锻炼。罗玉源时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主抓政治组工作，经县领导班子研究决定，由他牵头，抽调得力干部负责接待安置工作。县革委会接到通知后立即行动，按照市下放干部的名单，根据每个干部的年龄和身体状况，4至5人编为一个小组，分别安置到平原及山区31个公社农村大队。

为了使县和公社干部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市下放干部的管理工作，县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孙海同和分管市下放干部管理工作的罗玉源在公社书记会议上一再强调：下放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教育社队干部和贫下中农，政治上信任他们，生活上关心他们，工作上支持他们，把管理工作落到实处，要充分发挥市下放干部的聪明才智和一技之长。

市下放干部到达县里后，县革委会召开了欢迎会，罗玉源介绍了房山的情况，宣布了分组名单，最后以公社为单位，用车接回进行妥善安置。

1969年5、6月间，县直机关干部近七百人，在天开二院办斗批改学习班已经结束，县革委会又组织本县干部到农村下放劳动锻炼。全县总计有四百多个农村大队，连同市下放干部，几乎村村有下放干部劳动锻炼。

根据市领导的指示要求，结合房山实际情况，明确下放干部劳动锻炼有三

项任务：一是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同群众打成一片。二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三是利用业余时间协助基层干部做好工作，为基层组织当好参谋和助手。同时，还要求下放干部要注意遵守群众纪律，个人有事要请假，每月有四天休假，每月召开一次生活会，保持下放干部小组的政治团结，为基层干部做表率。

为了加强管理工作，县革委会组建管理工作小组，由县革委政治组中的干部组具体负责。为此，县抽调7名干部组成专职办公室。由马振君任组长，工作人员有郑旭光、陈广水、孟德礼、米林、姜文忠和铁四师的小黄等。同时，还从下放干部中选调七、八名年富力强、文化理论水平较高的同志，协助县管理工作小组为下放干部服务。县管理工作小组经常组成若干调查工作组，深入社队和下放干部住处，座谈走访、了解情况、总结经验、掌握下放干部的先进事迹和好人好事。

从1969年春到1971年近两年的时间里，市县下放干部中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在1970年全县有80余人（或小组）出席了北京市召开的下放干部表彰大会。在这次大会上，由于房山县对下放干部的管理抓得突出，也受到市领导的表扬。会后，县管理小组按照领导的要求，还将《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刊登的五十余名下放干部的先进事迹编印成册，书名为《广阔天地练红心》，发给下放干部每人一册，很受大家的欢迎。

广大市县下放干部在劳动锻炼期间，情绪高涨，积极主动参加劳动。他们把下放劳动锻炼看作是接受党的考验，是党和国家对自己的培养教育。不管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多么艰苦，都丝毫不影响他们的革命精神。尤其是在深山区下放劳动的同志，他们几乎每天都要爬山涉水，有的要往返步行二、三十里路，付出了更加艰辛的劳动。就是这样艰苦的劳动条件，都是以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自觉坚持，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赞扬。

在1971年农村“一打三反”工作中，在公社党委和农村党支部的要求下，下放干部小组积极参与活动，使农村比较稳妥地完成了“一打三反”任务。在农村落实“四类分子”政策期间，有的村落实任务较大，下放干部发挥了懂政策、懂法律的专长，引导党支部和贫下中农坚持实事求是、区别对待、按照政策逐个评审，逐人作出符合法律要求的结论，使党的教育改造区别对待的政策，得到很好地落实。由于下放干部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不少大队生产队改变了落后面貌，有的村成为落后变先进的典型，下放干部成了干部群众的贴心人，有

的下放干部组长被誉为“参谋长”。大紫草坞村下放干部组长常彬，由于工作突出，被公社党委推选为1969年国庆二十周年的观礼代表，10月1日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参加了国庆观礼和焰火晚会。

市下放干部王康久，1938年入党，市卫生局副局长，通过一年的农村劳动锻炼，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变化。他在总结劳动收获时说：“插队劳动，使我焕发了革命青春。捧起了一捧麦，感到接近了贫下中农的心。”他在紧张的劳动之余，坚持为农村干部读书读报，为农民看病针灸。他的先进事迹，曾先后被《北京日报》、中央和市广播电台和对外播音节目所录用。原市文联主席著名作家浩然在周口店南街村劳动锻炼，他积极主动帮助村里搞学习宣传工作。他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编写人们喜闻乐见的诗歌、快板，组织青年开展文艺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文化建设，他与该村许多农民建立了很好的朋友关系。

回想下放干部这项工作，他们的许多感人事迹，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是依然感到十分亲切，难以忘怀。

吴庄村房良分治的回忆

刘树楦

我的老家是阎村镇吴庄。我于 1940 年出生，解放时虽只八九岁，但我清楚地记得，解放前我村由当时的河北省房良两县分治的一些情况。

解放前，吴庄村由东西向的两条街组成。北道街是主街，也是往东经小紫草坞、东沿村通良乡，往西经焦庄、羊头岗通房山的通道。解放前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北道街中间靠北的地方埋有一块界石。界石东归房山县管，界石西归良乡县管。我还记得界石上部中间还有一道南北向的裂缝，听老人讲是一次雷击造成的。

当时的吴庄是一个百十来户的小村，主街从东到西仅二百来米。从自然上讲，村子处于以坨里延伸到村东的小山坡的尽头边缘，全村较平，村中间并没有河沟、山岗之类便于划界的标志性地形地物。从社会上说，村里东西两部分也没有姓氏、宗族等等的不和。村子东西两部分一直相安无事过着平平常常的生活。为什么把这样一个小村分成东西两部分，由房良两县分治，而且更奇怪的是村子西部是房山县界，村子的东部是良乡县界，而村子的东半部却归房山县管，而村子的西部却归良乡县管。对此，我曾找过村里的老人，查阅过有关资料，想弄个明白，但都无果而终。我只见过一张 1939 年时房良两县的地图，县界正从村子中间经过。当时，我村倒是有这样一个情况：村子基本是个穷村，大都是穷苦人家。只有毕家是个大户，地多、钱多、有文化的人多，解放时只有毕家被划为地主。当时，毕家不仅有农村少见的秀才，还有更少有的大学毕业生。而毕家大院就紧挨着界石，在界石的西部，在南北两道街之间还有他们很大的空院子。南北两道街都是以他家为界归当时的良乡县管。据此，就有人分析，认为这是村子西半部归良乡县管，而东部却归房山县管的一个可能的原因。

因为一个村子由房良两县分治，村子东西两部分的情况就有了很大的不同。我家住在村子的南道街的路北，西隔壁就是毕家的空院子，我家归房山县管，我家往西就归良乡县管。因此，对两部分不同的状况记忆非常深刻。明显的是，归房山县管的东半部公差多，房山张德祥保安团部队的骚扰多，苛捐杂

税多。关于公差多，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我哥哥仅十三四岁，每隔一天就要扛着铁锨跟着别的大人一起到坨里去修炮楼。我村到坨里是十二里地，不用说干活吃力，光一天跑二十四里也够受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坨里是张德祥部队的重要据点，就逼着他们管辖下的老百姓为他们修炮楼，谁敢不去给你扣上个“通共”的帽子。而东村西头归良乡县管的公差就少得多，良乡县国民党的部队也不怎么来。因我家西边就是良乡县地面，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因为有这个区别，归房山县管的人有了什么麻烦往往就往村西跑，就躲过去了。我记得，我父亲有好几次听说张德祥部队要来，就翻过西墙到毕家空院去躲，没事了再回来。

解放后，全村划归当时的河北省良乡县管，结束了一村两治的情况。

在房山二区工作的几点记忆

张 珍

1952 年底，我从房山县初级师范学校毕业，被分到房山二区政府任教育干事。二区是革命老区。早在 1939 年，以十渡为中心的二十多个村庄，在房良联合抗日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十渡村就建立了第二区政府（当时的一区政府和联合抗日县政府均在堂上村）。

我自 1952 年底来到二区，到 1954 年 4 月房山县撤区建乡为止，工作了将近两年时间。回顾在二区政府工作期间，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

作为出学校门进机关门的一名新干部，我对党的方针政策、农村情况和党政基层组织情况等都知之甚少，脑子里一片空白。当时的区委书记蔡景超（本县蔡庄村人）在我到二区的第七天，在谈话时，对我讲必须树立艰苦奋斗精神，要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做好工作。二区共有二十八个村，都是山区，必须以肯于吃苦的精神，与干部群众同甘共苦。

在 1953 年春耕大忙时，区委书记蔡景超亲自带领我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到重点村检查指导春耕播种工作。我们一天步行一百二十华里走访了四个重点村。第二天，蔡书记在十渡召开了片会，向各村干部讲述了昨天一天了解的情况和继续抓紧春耕播种的要求。这次区委书记亲自带队的走访调查，使我亲身感受到区委领导的艰辛和深入实际的工作，在我的心目中树立起深入实际和艰苦奋斗的形象。

区政府领导也同样关心和爱护青年干部的成长。区长张凤荣（本县北尚乐村人）、副区长赵子厚（后任区长、本县西白岱村人）每次安排干部下乡工作时，总是把我安排在与有实际工作经验的老同志一起工作。像财政助理员邱孝启（饶乐府村人）、民政助理员王永清（房山城关东关村人）、区委宣传委员马保恩（瓦窑头村人）等，我都得到过他们的关心和帮助。

我在下乡工作时，一次夜晚突发急病，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关怀使我终生难忘。1953 年夏天，我在卧龙村下乡抓生产，一天晚上吃过派饭后召开村干

部会议时，突然发生肚子剧烈疼痛，上吐下泻，浑身出虚汗，到夜十点左右，为救治我的腹泻疼痛，村党支部书记隗有良同志立即组织人员用门板作担架，派出五个强壮劳力，行程二十多华里的山路，把我抬到十渡村卫生所，经过一夜的打针输液，病情才稳定下来。

山区教育条件简陋，办学艰苦。1953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二区有28个村，村村有了初级小学，并在张坊、六渡和十渡三个中心村，建立了完全小学。由白磊（本县张坊村人）任区小学总校长。当时各村小学除三个中心小学的教室桌椅比较整齐外，其它各村的小学校，教室都是破旧的大屋子，所用的课桌椅，有的是学生从自家带来的破旧桌子，有的村是用石头垒的石头墩子。有不少学生由于自家没有凳子，只好站着听课写作业。师资不足，除三个中心小学科目比较齐全外，其它村都是一校一室一位教师。其中几个村的教师是从本村有些文化知识的中老年人中选拔上来的。这些小学教师，白天为各年级学生分别授课，夜晚还要协助村干部开会，负责读文件或做记录，教学质量普遍偏低，适龄儿童入学率低。由于二区地处深山区，贫困家庭多，失学儿童多。儿童八九岁就要帮助大人干农活，无时间上学，失学儿童一般要占到近一半以上。一般村庄的小学生，只有一二十人或三四十人。学生年龄也参差不齐，有的十七、八岁才上五、六年级。但他们知道上学不容易，大多数都学习刻苦认真，成绩较好，毕业后，大部分都参加了革命工作。